

主辦：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 (IPDC)

協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 (CPS)

星隕光存，薪火永續

——緬懷“生態聖賢”柯布院士逝世一周年紀念會隆重召開

楊麗嬌

跨越太平洋的晨昏，聯結起東西半球的思念。當太平洋時間 2026 年 2 月 7 日的暮色漫過克萊蒙，北京時間 2 月 8 日的晨光已經撫華夏大地，中外百餘位過程哲學和建設性後現代哲學的同仁齊聚雲端，以一場題為“相信生命”的線上紀念會，緬懷“生態聖賢”小約翰·柯布院士 (John B.Cobb, Jr.) 逝世一周年。紀念會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項目主任樊美筠博士和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安德魯·施瓦茨 (Andrew Schwartz) 共同主持。從開場的靜默致哀到最後的寄語新生，從思想的深度回望到實踐的熱忱分享，從跨代際的心靈共鳴到跨文化的智慧交融，這場紀念會以七段議程為脈，以思念與傳承為魂，勾勒出我們時代的“生態聖賢”柯布院士一生的思想光芒與精神高度，更凝聚起同仁們賡續其志、奔赴生態文明未來的堅定信念。

柯布院士生於 1925 年，以百年人生深耕懷特海過程哲學，以畢生之力倡導生態文明，將西方過程思維與東方文化智慧相融，為人類走出現代性困境點亮了思想明燈。華夏文明素有“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

傳統，而此次追思，不僅是對一位思想巨人的致敬，更是對人類共同未來的思考，讓柯布院士的智慧在東西文化的交融中，綻放出更璀璨的光芒。

一、開場與安靜時刻

無言的靜默，是最真摯的思念，是跨越山海的心靈共鳴，恰合儒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敬畏之心，讓每一位與會者都在心底與柯布院士進行着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那一刻，太平洋的風與華夏的雲相融，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膚色，都因同一個名字而心生戚戚，因同一份信仰而心意相通。隨後，美國柯布研究院摩爾院長 (Mary

Elizabeth Moore)

與北京師範大學
哲學院資深教授、

《自然辯證法研究》

原主編劉孝廷以

“我們為何相聚”

開啓分享，寥寥數

本期要目

- | | |
|---------------------------|----|
| ◆ 星隕光存，薪火永續 | 01 |
| ◆ 厚德載道：走向“厚道的第二次
啟蒙” | 06 |
| ◆ 過程哲學呼喚一種新思維範式 | 08 |
| ◆ 《最後的編織》與第二次啟蒙 | 11 |
| ◆ 你以為你在經歷人生，其實人生
正在經歷你 | 13 |
| ◆ 生態文明新術語——生態發展 | 16 |



John B. Cobb, Jr.
An Eco-Sage of Our Time
An Online Memorial Gathering

Saturday, February 7, 5:00pm PST

The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橋 The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ctr4process.org/events/

語，道盡相聚的初心。作為柯布院士的入室弟子與中國學術界的代表之一，二人分別從西方與東方的視角，詮釋了這場紀念會的意義：為緬懷一位將一生獻給過程哲學與生態事業的思想巨人，為傳承一種破解現代性困境的建設性後現代思維，為凝聚一個以生態文明為目標的全球共同體。

他們的發言，如一縷春風，吹散了時空的隔閡，讓百餘位同仁深知，此次相聚，不僅是追思，更是集結；不僅是回望，更是出發。這正是柯布院士所倡導的“社群精神”的生動體現，如《禮記·大同》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因共同的理想與追求，天涯海角皆為同道，山海相隔亦為同心。

二、生命與思想回望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董事會主席杰伊·邁克丹尼爾博士（Jay McDaniel）的發言，成為整場會議的思想基石。他從懷特海過程哲學的視角出發，將柯布院士的精神遺

產凝練為六重“感之善誘”，為與會者解碼了柯布思想何以超越時空，成為永恒的精神指引。

邁克丹尼爾博士直言，或許把柯布院士的故去理解為“前行”更恰當些。因為他從未真正屬於過去，他“前行”進入了人們的內心與記憶，更從未來走向我們，以那些被他化為現實的可能性，召喚着後來者繼續前行。這六重善誘，是柯布院士一生思想與實踐的精髓，更是他留給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

其一，對世界整體懷有好奇，拒絕知識的割裂，倡導做“有機知識分子”。讓人們以萬物互聯互倚的視角看世界，將生物學、心理學、生態學、經濟學等諸多領域視為一個有機整體，打破了現代性分科之學的桎梏。

其二，為生態文明的宏大夢想所啟迪，呼喚人類彼此尊重、關愛，

更關懷整個生命共同體。這是儒家“仁愛”思想的跨文化延伸，從“愛人”到“愛萬物”，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仁愛精神，成為生態文明的核心價值。

其三，體認“社群中的人”，拒絕孤立的個體主義，認為社群如漣漪般向外擴展，直至整個地球共同體。這與墨家“兼相愛，交相利”的理念一脈相承，讓人們深知，個體的命運永遠與他人的命運、與自然命運、與天地的命運緊密相連。

其四，堅信萬物有靈，打破“死寂的物質”或“無意義的存在”之幻象，指出宇宙充盈着“氣”——這一源自中國道家的核心概念，讓事實與價值相融，在生命性中發現美，即便面對悲劇亦然。這正是《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命觀的西方表達，讓人們重新敬畏萬物的內在價值。

其五，在日常生活中踐行善意，過簡樸、不矯飾

的生活，以真實需求替代人為制造的需求與貪婪。這恰合道家“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的生活智慧，也與儒家“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修身之道相契合，柯布院士以自身為典範，詮釋了簡樸既是莊嚴，亦是自由。

其六，將愛置于生命的中心，相信宇宙被更深的愛所包裹，憑信心生活，以溫柔的關懷擁抱每一個生命。這是佛教“慈悲為懷，普度衆生”的慈悲精神與西方博愛思想的交融，讓愛成為連接萬物、構建共同體的精神紐帶。邁克丹尼爾博士的解讀，猶如一把鑰匙，打開了理解柯布思想的大門，讓與會者深知，柯布院士的思想并非孤立的西方哲學理論，而是與東方儒釋道智慧深度契合的人類共同智慧，這也為其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著名懷特海研究專家、《懷特海全集》主編楊富斌教授的發言，從學術傳承的角度，進一步詮釋了柯布院士的偉大價值。作為懷特海過程哲學的第三代傳人，柯布院士的一生，是深耕學術、薪火相傳的一生，更是心懷天下、踐行使命的一生。楊富斌教授指出，當今世界，懷特海過程哲學的研究能薪火不息，建設性後現代思想能成為反思現代性的重要資源，中國生態文明建設能獲得堅實的哲學支撐，皆受惠于柯布院士的開拓與堅守。他以畢生之力，將哲學智慧與人類命運緊密相連，用思想的力量為人類破解生態危機點亮了明燈。楊富斌先生援引懷特海《論不朽》的觀點：“宇宙中生成的任何現實事物，其價值都將融入整個宇宙機體之中，成為宇宙創造性進展的材料”，深刻詮釋了柯布院士“不朽”的真正內涵。真正的不朽，不在于生命的長度，而在于思想的厚度、價值的廣度，在于為人類文明留下的精神財富能否永遠滋養後人。柯布院士雖已離去，但他的思想早已成為宇宙創造性進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人類邁向生態文明的精神根基。這份不朽，正是對“生態聖賢”最貼切的注解，亦如《左傳》所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柯布院士以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了真正的不朽。

三、個人回憶與見證

個人回憶與見證環節，讓柯布院士的形象從思想的殿堂走入鮮活的生活，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安德魯·施瓦茨、北京懷特海幼兒園創辦人閻曉霞女士，以及著名過程教育家、哈爾濱師範大學楊麗教授的分享，以親身經歷訴說著柯布院士的人格魅力與思想的實踐力量，讓思念變得具體而溫暖。其中，楊麗教授以自己與過程哲學、與柯布院士的結緣為線索，展現了柯布思想如何從理論走向實踐，如何改變一個人的思維方式，乃至一個群體的教育實踐。楊麗教授與懷特海哲學的緣分，始于2007年王治河博士的一場學術報告，而這份緣分的背後，是柯布院士在懷特海哲學不被認可的年代，始終執着堅守、默默傳承的努力。2013年，楊麗教授在克萊蒙與柯布院士初次相見，這場相遇成為她學術生涯與教育實踐的重要轉折點，讓她深刻感受到懷特海哲學及教育思想對中國教育的重要意義。

此後，楊麗教授帶領研究生堅持九年多“夜讀懷特海”，將過程－關係思維融入課程與教學研究。自2010年起，她與研究生從未缺席過程哲學暑期班，讓懷特海的思想成為師生們看世界的“慧眼”。她援引柯布院士在《為什麼選擇懷特海》中的判斷：“世界需要某種綜合思維方式，懷特海最接近于提供一種綜合性的洞見”，更以柯布院士“我的最大興趣在于對這一思想的應用”為追求，將過程哲學融入研究生的論文與著作，讓抽象的哲學思想成為解決中國教育問題的有效工具。

楊麗教授的分享，讓與會者看到了柯布思想的強大生命力。最好的緬懷，莫過于將先哲的思想化為改變世界的力量，而這，正是柯布院士最希望看到的景象。

四、對我們時代的意義

彰顯柯布思想的當代價值——“對我們時代的意義”環節，美國耶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世界範圍探討儒家生態思想的領軍人物瑪麗·伊芙琳·塔克博士（Mary Evelyn Tucker）、“柯布共同福祉獎”得主、東莞泰威公司董事長李文良先生、新農人/生態作家于思群女士的發言，從跨文化對話與本土實踐兩個維度，闡釋了柯布院士思想的時代價值與世界意義，尤其彰顯

了其思想與中國文化、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度契合。塔克博士的發言，為與會者揭開了柯布院士跨文化視野的形成根源。

柯布院士 1925 年生于日本神戶，在東亞文化的浸潤中度過少年時光，美國南方社會的種族歧視令他深感不安，而東亞文化的包容與智慧則讓他心生認同，這份早年經歷成為他跨文化對話的起點。他與日本京都學派禪學大師阿部正雄共同主持的學術對話，成為跨文化交流的典範，開啓了開放交流、耐心傾聽、深入學習、彼此轉化的全新方向，為跨文化靈性對話領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而柯布院士的跨文化探索，最終深深扎根于中國。他對中國文化與哲學的真誠理解，讓他與王治河、樊美筠等同仁一道，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生態文明的創建，協助中國建立了 30 餘個過程思想和建設性後現代哲學研究中心。

塔克博士將柯布院士對中國的影響，與 20 世紀初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影響相提並論，這一評價，恰如其分地彰顯了柯布院士對中國思想界與實踐界的深遠意義。柯布院士的思想，與中國正在推進的生態文明建設形成了深度呼應，他所強調的對現代性的反思，正是中國突破不可持續發展模式、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內在需求。

如果說塔克博士的發言展現了柯布思想的跨文化價值，那麼李文良先生的分享，則讓與會者看到了柯布思想在中國本土生態企業實踐中的生動落地。201 年，李文良先生在深圳與柯布院士的初次相見，一句“全球兩百多個國家，祇有中國提出生態文明，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如一粒種子，在他心中生根發芽。2024 年，柯布院士聽完李文良關於泰威公司“天地人和 51-25-24 股權方案”的實踐匯報後，稱其為自己“百歲生日的禮物”。這份認可，是對中國本土生態實踐的巨大肯定。李文良先生所推動的“天地人和”生態企業治理模式，正是將柯布的生態文明思想與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智慧相結合，探索出的企業生態轉型的可行路徑。在氣候危機步步緊逼的當下，柯布院士“人類必須從工業文明的自毀之路轉向生態文明”的呼吁振聳發

聳，而中國企業的實踐，正在印證着他的判斷，也正在踐行着他的夢想。

吉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吉林大學資深教授賀來與匈牙利著名生態文明研究專家、匈牙利布達佩斯長期可持續性研究中心主任阿提拉·格蘭皮埃爾（Attila Grandpierre）一道緬懷了柯布的為學與做人。

賀來說，2004 年曾受王治河博士邀請訪問克萊蒙，見到柯布先生，二十多年來一直十分懷念他。在他看來，柯布博士是為人與為學高度統一的大哲。這讓他想起費爾巴哈的觀點：真正的哲學不祇是著書立說，更是成就立說之人。從與柯布先生的交往和其學問中，他收獲了極為重要的教益。看到衆多學者參會、其思想在世界範圍廣泛傳播并形成重要思潮，賀來教授說自己很高興，並相信柯布先生的思想與人格風範，將持續影響大家的信念，也將深刻影響中國的發展。

五、相信生命——共同靜默與回應

不同的聲音，相同的思念，讓這場紀念會的情感愈發濃烈。“相信生命：共同靜默與回應”環節，則將這場紀念會的情感推向了高潮。安德魯博士朗讀了柯布院士《拯救地球的十大觀念》中的片段：“我相信，在宇宙創造力之內和之下的靈感都是神聖的。我們人類負有保護彼此和自然界其餘部分的獨特責任。我們被上帝召喚為大自然的守護者。”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項目主任、柯布生態書院院長樊美筠博士則朗讀了《生態文明的五大基礎》中的經典語句：“我們需要超越個體小我的執着，找到作為這個小小星球上衆多生靈中的一種的‘我們’的使命……祇要我們今天有勇氣挑戰現代思維，人類的明天就有希望。”這些文字，是柯布院士留給人類的叮囑，是他對生命的信仰，對未來的期許。

隨後的共同靜默，讓每一位與會者都在心底與柯布院士對話，與自己的內心對話，與整個生命共同體對話。伴隨着樊美筠博士和 AI 共同創作的一曲《流光》的樂聲流淌，柯布院士如一束流光，照亮了人類的生態之路的一生在與會者心中浮現，而這份光芒，也必將由無數生態人接續傳遞，光光輝映，流布世界。

六、托付與繼續

“托付與繼續”環節，是這場紀念會的精神核心，北師港浸大懷特海研究中心主任郭海鵬教授、洛陽柯布院士工作站丁沙沙秘書長、河北省心理諮詢師協會理事長劉巍博士的鏗鏘發言，接過了柯布院士傳遞的思想火炬，許下了繼續前行的承諾。

郭海鵬教授以“從紀念到傳承：懷特海、柯布與未來的工作”為題發表了飽含深情的講話。他說緬懷柯布教授的最好方式就是傳承他的遺志，推進他的事業，做那些能讓他感到欣慰的事情。他分享了懷特海研究中心的工作進展。2025年，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懷特海全集》的翻譯、編纂和出版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已有幾卷出版，其餘各卷也在有條不紊地推進。這部全集的出版將為系統深入地理解懷特海的思想提供更堅實、更全面的文本基礎，並有助於中國學術界參與全球哲學對話。

此外，2025年恰逢懷特海的代表作《科學與現代世界》出版100周年。為紀念這一時刻，他們中心與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合作，成功舉辦了題為“科學與後現代世界：懷特海願景及思想遺產百年回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美兩國的學者跨越時空界限，共同回望這一哲學巨擘的百年智慧，探討其哲學對當代生態文明的啟迪，讓古典思想在當下的語境中重新煥發出生機。隨着第十四屆國際懷特海大會的臨近，這趟思想的旅程還將繼續延伸，在傳承與開拓之間，譜寫屬於未來的哲學篇章。

丁沙沙秘書長作為實踐者的代表，分享了將柯布思想從書齋帶入公眾生活的探索。作為洛陽柯布院士工作站秘書長，同時肩負着嵩山世界地質研學博物館和龍門海洋館的實踐責任，她深知，場館不僅是知識的陳列地，更是生態文明的傳播舞臺。她提出，要將場館從“信息傳遞者”轉變為“意識連接與行動催化的平臺”，讓哲學變得可感，讓生命共同體從抽象的學術語言變為直擊心靈的具身體驗。將傳統的知識陳列轉變為關聯敘事和過程敘事，讓每一次參觀都成為關於共生、責任與希望的沉浸式對話。

河北心理諮詢師協會理事長劉巍博士深情的回憶

了柯老對他事業的點撥——將西方心理學與中國傳統典籍《易經》相結合，這份點撥為他的研究打開新境，讓他在實踐中走出中西融合的心理服務之路，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有機療愈”之路上奮勇前行。

劉巍博士深情地談到柯老庭院的紫玉蘭，談到“與自然共舞”的生命態度，坦言“春天從未離開過”——他用詩一般的語言抒發了對柯老的思念，令在場者無不動容。

七、薪火相繼，以新續舊

致謝與告別環節，是思念的收尾，更是希望的開端。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漢森（Bruce Hanson）博士與執行院長王治河博士的致謝，讓與會者感受到了這場紀念會的溫暖與力量，而最動人的瞬間，莫過於高中生陳霽容的發言。這位來自北京11中學的少女，因為2025年在浙江師範大學參加了第18屆過程哲學暑期班接觸到懷特海學術與柯布思想，從此打開了看世界的全新視角。她坦言，柯布的建設性後現代思想讓她學會了以整體、聯系的視角看待世界，告別了片面的思維方式，將不同學科整合在一起，對構建和諧可持續的社會有了更深的認識。在過程哲學的指引下，她提升了實踐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希望將哲學作為自己日後在大學的研究方向，為人類解決生態問題做出貢獻。這位少年學人的發言，讓與會者看到了柯布思想的未來，也讓人們堅信，柯布院士的事業，必將後繼有人。

最後，王治河博士再次重申了柯布思想的價值。在他看來柯布院士最大的貢獻，就是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過程共同體、建設性後現代共同體、生態文明共同體，而“相互成全，成人之美”正是這個共同體的密碼。

王治河博士認為，柯布院士一生踐行有機語言，“說有溫度的話，說有營養的話，說負責的話，說建設性的話”。而他的語言，正是他內心風景與偉大格局的寫照。一言蔽之，“過程哲學讓你智慧，生態文明令你幸福”，王博士以“馬到成功”的新年美好祝願，為這場紀念會畫上圓滿的句號。

（作者楊麗嬌，西安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

厚德載道：走向“厚道的第二次啓蒙”

——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最新動態與核心議題講座有感

賈 婧

2025年12月2日，北京林業大學“學科前沿講座”特邀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治河老師，就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最新動態與核心議題展開深入分享。盡管講座開始時間已是美國地區的深夜時分，但王老師仍然以熱情幽默的講學風格為學子們帶來一場鏈條清晰、思想深邃的學術探索之旅。本次講座圍繞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代表、核心觀點、哲學基礎及最新動態展開，其中對現代性的辯證批判尤發人深省，謹撰此拙文，以記錄個人的學習感悟。

回溯過往，工業文明以來的“第一次啓蒙”雖高舉理性與進步之旗，却在實踐中滑向對自然的徵服與對他者的支配。究其根本，這仍是一條以人類為中心的“霸道”歧途。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所呼喚的“第二次啓蒙”則試圖走上一條迥然不同的“厚道”之路，它并非否定現代精神本身，而是對其局限之處進行辯證揚棄，以期進行一種生態文明方向的超越。如果說“第一次啓蒙”是刺向封建專制的一把利刃，那“第二次啓蒙”更像是滋養萬物的厚土，它不以徵服為榮，而以共生為道；不以理性獨斷為尊，而以多元對話為貴。

一、厚道共栖

“巍峨的高峰”、“無人的荒原”是康德筆下引發“崇高”感的典型審美對象，那是“理性”對無限自然的震顫與臣服。人類文明的序幕正是在對自然的敬畏與崇拜中緩緩開啓，彼時的他們和其它生靈一樣，仰賴于自然的饋贈，奉自然如神明。然而，隨着文明的不斷發展，鋼鐵機械、科學技術為人類穿上傲慢的盔甲，“徵服自然”成為人類為自己確定的新時代綱領，自然不再是神聖的家園，而是淪為可計算、可操控、可榨取的資源庫。這種對自然的帝國主義態度結出驚人的惡果，生態環境問題成為全人類都必須面對的灰犀牛事件。

基于此，“第二次啓蒙”號召我們走一條“厚道共栖”的自然之路。“厚”字的詞義演變經歷了從物理到精神的變化，最早用它來形容空間容量，後來這一份容量引申為“寬厚”、“忠厚”。這份“寬厚包容”天生與現代精神中的“功利”、“效率”、“竭澤而漁”等精神相悖，它要求人類在“利用”之餘，還應有海納百川的度量，在逐利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持有一種“共生互惠”的基本原則，盡量減少對其它物種的排他性行為。在歐盟 LANDMARK 項目 Soil Navigator 農田管理決策系統中，土壤健康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就包含了“生物多樣性維持”這一選項，通過考察真菌生物量、綫蟲豐度等指標，去檢測土壤的健康程度並及時幹預。盡管設計這個系統的初衷是優化土壤生產力，但它仍與早期的粗放式土地使用方法有較大的不同，因為這個設計內含將土地視為一個由微生物、植物、動物共同構成的生命共同體的生態思維。君子參贊化育，人類作為生物圈中有高等智慧的族群，其天賦的能力不該祇為自身服務，而是應該跳出“需求—滿足”的原始驅動力，去尋找超越自身的價值，以人類智慧去構建一個允許多物種共生共存的高質量生態環境。

“厚道共栖”不單是物理意義上對現有空間的重新分配，更是對人與自然之間情感聯結的重建。正如斯普瑞特奈克在《真實之復興》中所寫：“即便是受了現代性天人分離教育的孩子，他們也常常與天然的地方情投意合——夏令營、祖父母的農場或自家附近的一個秘密地方。那個地方，那個他們曾以一個孩子的全部心靈去體驗的地方所帶給他們的感覺，會印入他們腦海，陪伴他們一生。那個地方的存在喚起了他們內心深處的想象力，多年來給他們提供庇護、支持、穩定和優雅的感覺”。地方與個體的情感紐帶不是通過知識傳授獲得

的，而是在身體感知與時間沉澱中自然生成，所以“生態共栖”的實現不僅需要技術手段，更需要時間與情感的投入。可以想象，當一個人曾在溪邊觀察蜻蜓羽化，或常年與林中鳥鳴相伴，他便不會輕易將一片濕地僅僅視為可填埋的“閑置土地”。

當然，我們也必須正視一個現實——情感聯結并不自動導向生態保護。正如一些伐木工人雖常年生活在森林之中，與樹木朝夕相處，却仍以砍伐為生。這提醒我們，“厚道共栖”不僅是個人情感的復蘇，更是社會結構與制度安排的重構，唯有當個體的情感認同被納入公平的經濟模式、合理的資源分配與可持續的生活方式之中，真正的“共栖”才有可能實現。

二、厚道共情

如果說“厚道共栖”是對自然的謙卑與敬畏，那麼“厚道共情”便是在尋找對生命的溫柔與體諒，“共栖”關乎我們如何與萬物同居于一片土地，而“共情”則追問我們如何與其它靈魂產生共鳴。它要求我們在面對其它生靈時，不以冷漠隔絕，也不以憐憫俯視，而是以“厚”的胸懷去感受、去理解、去回應。

韓炳哲在《愛欲之死》中寫道：“自戀與自愛不同。自愛的主體以自我為出發點，與他者明確劃清界限；自戀的主體界限是模糊的，整個世界祇是‘自我’的一個倒影。他者身上的差異性無法被感知和認可，在任何時空中能被一再感知的祇有‘自我’。在到處都是‘自我’的深淵中漂流，直至溺亡”。在第一次啟蒙的鼓勵下，自立、自由的概念促使每個個體着眼于謀求自身福利，情感也從外向連接轉向對自我形象維護而展示出的自戀式的滿足。“他者”的消失讓情感成為孤立的自產物的核心原因是：功績社會不僅制造了抑鬱和倦怠，并且伴隨產生了一種須彌的“自由”，“他者”本身所具有的否定性和異質性消失了，世界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自我復制品，這導致了情感的淺薄化。

所以“第二次啟蒙”號召的厚道式情感是新文明轉變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內驅力。“厚道共情”主要的哲學基礎其實可以追溯到懷特海過程哲學，在懷特海看來，世界是由相互“攝入”、相互關聯的現實事態構成的“社群”，一個持存的個體就是一個“具有社會秩序

的結合體”，其內部經驗時刻相互繼承，并與外部世界保持密切的關聯。所以“厚道共情”中“共”并非來自外部的道德強求，而是源于過程哲學的本體論要求。社群的關係性以及歷史的連續性就注定每個個體無法是孤立的、停滯的，而現代情感所呈現的孤立狀態本身就是一種異化狀態，這種異化狀態在現代科技社會進一步加重，也給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生態的關係都帶來極大的打擊。

一個情感萎靡、總是自怨自艾的人，是無力關注除自身利益相關外的其它信息，鄰裏關係、物種多樣性、生態環境惡化，這些信息對他而言皆為幹擾，他的核心目標就是完成現代消費系統派給他的任務，獲取資源，提升等級。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當人的本質活動被外化為謀生手段，其內在豐富性便遭剝奪，而指引個體走出異化迷霧需要的就是一種“厚道共情”。這種“共情”需要個體摒棄主客二分的競爭式思維，放棄沉迷個人得失的病態獨角戲，甚至需要社群回落到一種較低效率的部落式生活。綜上，“厚道共情”實是面對情感異化時的一種本體性回歸，它要求我們放下對效率、功績的執念，以“厚”的包容與“共”的聯結，重新學會看見、感受并回應那些曾被我們視作“幹擾”的真實存在。

在許多城市社區中，流浪貓狗長期生活于街巷角落，成為居民日常的一部分。然而，當社區進行環境整治時，它們往往因被視為“隱患”而統一捕捉、驅逐甚至安樂死。這種處理方式背後，并非完全出于對動物的敵意，而是源于一種情感上的冷漠與疏離，這種“去情感化”的治理邏輯，正是“厚道共情”所要突破的障礙。真正的“厚道共情”，不是簡單的投喂流浪動物，而是承認它們也是這片土地上的“鄰居”，有權不被輕易驅逐。所以，“厚道共情”對個體基本要求有兩個方面，它既希望我們在真實生活的體悟中不斷充盈情感，同時運用情感的力量主動與他人、動物乃至自然萬物建立一種平等、尊重的關係聯結。

行文至此，不難看出筆者對現代性的諸多表徵持批判態度，而且細看“厚道共栖”與“厚道共情”，裏面也均是物理空間與內在靈魂的雙重“退讓”。但是，

“反者道之動”，如果人類文明已經超速發展多年，一段舒緩甚至是退讓的發展邏輯是否反而更符合當下時代的召喚呢？《禮記·樂記》有言：“和，故百物皆化”，萬物之化育得益于內在關係的調適與容納，“第二次啟蒙”的要義，正在于從“霸道”轉向“厚道”，其所呼

吁的就是全人類對當下以控制、榨取、同質化為文明前進方向的反思，以及對以包容、寬厚與共育為新理性的未來的召喚。

（作者賈婧，北京林業大學碩士研究生）

過程哲學呼吁一種新思維範式

——參加第十八屆過程哲學暑期班有感

陳霽容

引言

不知從何時開始，現代人對世界的認識變得越來越割裂而模糊。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雖然極大地拓展了人類對宇宙和自身的認知，却也將人們的思維固化在一個個的模型和定理中。在現代機械化的思維範式下，人類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孤獨，這種孤獨體現在人們對生命最原始的詰問被冰冷的數字、公式以沉默的回應中，充斥在人與自然、他人及社會疏離隔膜的關係裏，最終蔓延為普遍的不安與焦灼，構成了現代人無法回避的精神危機。

這種割裂感在我今年的大學申請過程中體會得格外深刻。當我真誠地向導師分享自己十六年來跨學科的學習經歷時，却被告知“興趣太廣泛，缺乏專業聚焦，難以塑造清晰的申請形象”。這樣的評價曾讓我陷入深深的困惑。我理解大學作為人才培養的平臺，需要通過專業性、社會價值和鮮明特質來進行高效篩選。但我不禁要問：這樣選拔出來的人才，真的能適應這個複雜多變的世界嗎？

從物理學到地質學，從歷史到藝術，再到環境科學，驅動我探索這些領域的，始終是對生命本質的追問：我將去向何方？人類將去向何方？宇宙又將去向何方？然而在現代教育體系中，這種整體性的求知方式却處處碰壁——為何理解世界就一定要把知識切割成

互不關聯的碎片？

在困惑與迷茫中，我轉向了哲學，期待這門古老學科能提供給我關於生命意義的系統思考。然而，占據西方主流的分析哲學並未給我答案。從柏拉圖開始的二元理論（理念世界與現象世界）到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將主客體、心物徹底分開，再到現代為回應懷疑論的存在主義與虛無主義，西方哲學似乎在解決一個問題的同時制造了更多問題。隨着近代科學興起，哲學與科學分離，理性與信仰對立，人類被割裂成碎片化的存在——人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親手殺死了上帝，也逐漸失掉了對理性的信心。

直到我接觸到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過程哲學，並參加了今年夏天在金華舉辦的第 18 屆過程哲學暑期班，才終於豁然開朗。懷特海提出的“過程即實在，實在即過程”的基本理念，以及他對宇宙有機聯系的深刻洞見，不僅與我先前在中國傳統儒釋道思想和多學科的探索融會貫通，更為我開啓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一種能夠回應 21 世紀複雜挑戰的整合性思維。

後現代思想下認知的轉變

我的求知之旅始於對生命本身的困惑。

孩提時代，我便對生死之事展現出了不屬於這個年齡的好奇心。我曾多次問過母親人死後會到哪裏去

的問題，母親當然無法回答，便以基督教的天堂地獄論搪塞我。基督教不僅告訴了你在世的標準，還明確指明了你的身前身後路。有相當多的人在這一步便停止了內心因虛無帶來的恐慌，選擇將自己的信仰交付給上帝。在學習了懷特海的過程哲學後，我越想越不對勁，如何證明上帝存在呢？阿奎那的五種證明方法并不能說服我：宇宙萬物的運動似乎并不需要一個人格化的上帝去推動。無論是從混沌到有序的趨勢，還是從一到多的演化，或許祇是順應了宇宙的自發趨勢。從這一點來看，道家思想所推崇的玄之又玄之“道”似乎更符合我對宇宙目的因的想象。笛卡爾對上帝的證明則完全建立在“我思故我在”這一前提之上。然而，“一個思考者無法進行兩次相同的思考”，此刻思考的我已然不同于上一刻思考的我。因此，單憑思考這一事實，既無法確證自身的存在，更遑論證明一個全知全能上帝的存在。

中學時期，經典物理學驕傲地為我展示了人給自然立法的成果，牛頓力學便是其中最輝煌的典範。然而，這個被經典物理學描繪的世界圖景是靜止而死寂的，與我們觀察到的鮮活現實存在着深刻矛盾。在微觀尺度，粒子的運動規律與宏觀世界的物理法則也許截然不同；被視為可逆可算的時間，却在每個生命體內以非線性的流速逝去不復返。當我坐在海邊觀察潮汐時，我發現：每一波浪都將沙粒推向新的位置，而每一波浪又由完全不同的水滴構成。這讓我意識到，真實的自然或許與我們認知的恰恰相反——它是隨機的、多元的、不可逆的。這種認知起初令人不安，仿佛剝奪了人類對自然的掌控感。但正是這種認知的轉變，讓我們得以用更平等、更長遠的視角來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重新思考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

高中時代，在地質學的學習過程中，我驚奇地發現一個矛盾的現象：盡管熵增定律規定了宇宙向無序發展的下降趨勢，生命演化却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向上創生態勢。在研討班研讀《理性的功能》時，懷特海的理論為這一現象提供了深刻解釋：生命在與熵增的持續對抗中，展現出一種特殊的理性——它指導有機體對環境進行主動改造。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理性完全不同于傳統西方二元論中的理性概念：它并非源于人類對

絕對真理的追求，也不執着于超越經驗的把握，而是根植于生命本身的創造性衝動。這是一種在關係中指向宇宙終極因的力量，既推動生命突破穩態創造繁榮，又在熵增過程中自我調節，展現出獨特的整合功能。

後來，我又將熱情傾注于藝術、美學和宗教這些在現代工業文明教育體系中被視為“無用”的學科。在我看來，藝術正是懷特海所說的“生命創造性”最生動的體現。藝術家創作并非僅僅是對理念世界的簡單摹仿，而是源于一種更高層次的欲望——人們通過美的體驗獲得審美滿足，主動將舊秩序轉化為新秩序，這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物理法則和適者生存的範疇。

《創造性的倫理》一書中提出，美是過程哲學中倫理的最高指向。傳統美學將美視為“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與二元論框架下的理性緊密相連。但在過程哲學看來，美并非人類獨有，它存在于現實實有（Actual occasion）在過程中各要素的相互調適裏，是看似無序變化中的終極目的。現實實有在攝入、合生、滿足的過程中，變動的表象與不變的、繼承性的現實持續產生對比（這不是二元分割，而是永恒客體與主觀形式間的相互調適與創生推進），創造力推動整個過程趨向滿足。最終達致的相對和諧，正是對美的某種追求。

這讓我想起地質考察時看到的火成岩節理自然形成的六邊形結構：岩漿在流動中隨着溫度、壓力和自身運動不斷改變形態，在變化中持續調適，最終呈現出最和諧、受力最小的結構。這，未嘗不是一種無生命體對美的趨同？

過程美學讓我們重拾了先前失掉的信心。因為以美為終極因，我們與世間萬物平等地向着積極目標邁進，這實際上肯定了人及其他有機體的內在價值。這不僅為後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價值提供了支撐，更在整體倫理層面向正引導我們追求最能成就美感（既對自己，也對其他生命）的道德義務。從美的角度理解道德，為其注入了生命的鮮活特質——我們行善不是出于社會規訓，而是在考量個體與整體關係的過程中，實現生命的藝術。

在過程哲學的啟發下，我也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宗教探索歷程。童年時期，我常隨父母出入廟宇虔誠禮佛。那時跪拜的并非我的理性，而是我的靈魂——它在

這具身體的主人尚未覺悟前，就已發出吶喊，迫使我超越“常人”的軀殼直面生命本質。在不安與恐懼中，宗教就像一雙溫暖的手，以超越性的存在撫平人類與生俱來的戰栗與渴望。如今回望，我意識到宗教在人類歷史中扮演着獨特角色：它為超越性意義的探索與世界沉默的現實之間架起橋梁，在理性之外為人類提供安身立命之所。這種功能在啟蒙運動之前（甚至之後）始終存在。而在過程思維中，宗教的價值並未消逝，反而獲得了新的詮釋。

比如，基督教所倡導的“愛”超越個體局限，本質上是對生命內在價值的肯定。信仰激發人們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宇宙創生，釋放創造潛能。而在東方思想中，過程性思維同樣能找到深刻共鳴：佛教“緣起性空”的教義揭示萬物都以各種條件合成而相互依存，否定了獨立自我的存在，也消解了主與客、人與自然的隔閡；道家則直接提出創造性的“道”的概念，將宇宙視為一個動態的生命機體，主張“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

在以上的反思回顧中，可以看到，過程哲學將我過去所有的知識有機地整合在了一起，並創生出新的智慧。整個過程正如“攝入理論”（prehension）所闡述的一樣，由一生多、生生不息。在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緊密相連，過去的生成非但沒有湮滅，反而幻化為新的創造的種子，不斷地回應着宇宙潛能的呼喚。我認為這才是哲學所應該給人帶來的功用：要與現實、先進科學、人的生活動態結合，作為指導思想幫助人類更好地生活，而非作為一門高度專業化、技術化的學科設立在高等院校，遠離了生命的真實困惑。

過程哲學呼喚一種新思維範式

當今世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挑戰——氣候危機迫在眉睫，文化認同日漸消解，疾病和戰爭仍在加劇着不平等現象。這些都不是孤立的問題，而是相互交織的系統性危機。它們正在向我們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人類急需一種全新的思維範式！這不是簡單的知識更新，而是一場徹底的認知革命——我們需要建立一種能夠理解系統性、應對變革性、把握關聯性的思維方式。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看清問題的本質，找到可持續的生存之道。

讓我們看一個簡單的例子：應對氣候危機的最大

障礙，其實不在於科學家找不到解決全球變暖的技術方案，而在於整個社會經濟系統尚未完成必要的轉型。這就導致許多環保技術和措施難以真正落地。企業要實現減排目標，不僅需要政府的資金支持和政策引導，更需要整個消費市場轉向綠色節能的需求。當前功利主義主導的生產模式，往往割裂了經濟活動與生態系統的內在聯系，也忽視了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的强大力量。因此，真正的變革必須始於思維方式的轉變。這種轉變會像水面的漣漪一樣，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從個人到企業，從市場到政策，環環相扣，最終推動整個系統的轉型。這不是單一技術或政策的問題，而是一場關乎我們如何理解世界、如何行動的深刻轉變。

在學習環境科學時，一個來自新西蘭的案例讓我深受觸動：經過毛利部落與政府長達 160 多年的抗爭，旺阿努伊河（Whanganui）在 2017 年終於被新西蘭議會賦予法律人格，享有與人類同等的權利和義務。這不僅是一項開創性的法律變革，更標志着後現代思維在人與自然關係認知上的重大突破。在這項立法中，河流不再被視為可供隨意剝削的資源客體，而是與人類共生共存的有機主體。生態保護由此內化為文化認同的一部分，而非外在的強制約束。這種思維轉變產生了驚人的蝴蝶效應：河流生態的改善造就了旖旎風光，吸引眾多游客帶動當地旅遊業；毛利部落的傳統文化獲得法律認可，他們與自然共生的古老智慧得以在 21 世紀煥發新生，持續影響着全球的生態價值觀。

過程思維的轉變必將引發教育的深刻變革。作為一名學生和未來的教育工作者，我深信教育體系需要將過程哲學的內核融入其中——這不僅是教學方法的調整，更是要建立一種多元化、整合性的全新教育範式。未來的教育應當突破學科間的表面聯系，真實地看到人類生存的根本困境，從各學科的內在價值出發，共同探索更美好的生存方式。教育也不應囿於校園圍牆，而應深入生態、扎根生活，引導學生真切體察自身生命在宇宙網絡中的位置，以及如何參與這場偉大的創造性進程。因為教育，終究是一切向上向善的力量源泉。

（作者陳霽容，第 18 屆過程哲學暑期班學員，北京市十一學校高中生）

《最後的編織》與第二次啓蒙

——從現代文明困境到人類共同體覺醒

佟金丹

芬蘭動畫短片《最後的編織》以6分15秒的極簡敘事，在懸崖邊的生死博弈中展開了一場建設性後現代的生存實踐。導演勞拉·諾伊沃寧以編織者墜落的紅色圍巾與沉默的懸崖空間，隱喻現代性思維方式及其發展模式將人類置于瀕臨毀滅的懸崖邊緣，由此批判第一次啓蒙所帶來的現代文明困境與人類生存危機。

第二次啓蒙以過程哲學與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為理論基礎，系統反思第一次啓蒙（包括歐洲啓蒙運動與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自然觀、科學崇拜、理性主義等方面的局限性，主張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走向有責任的深度自由、尊重地方性知識與文化多樣性等，這些理念為解讀《最後的編織》提供了建設性後現代的理論視野和框架。

本文將從解構第一次啓蒙的現代性規訓、重建共生倫理、實踐創造性重構三個維度，剖析短片如何通過動畫語言呈現出第二次啓蒙對於第一次啓蒙的哲學超越——在解構中重構，在批判中建設，最終指向一個有機整體、生態和諧的創造性未來。

一、解構第一次啓蒙的現代性規訓

現代性規訓是由第一次啓蒙所塑造和強化的一種社會秩序與價值體系，它以理性、科學、進步等理念為核心，構建起一套看似合理且具有強大約束力的規則與制度，曾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如推動工業化進程、提升科學技術水平等。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它的弊端也愈發凸顯，過度強調工具理性、經濟主義至上和人類中心主義等理念所導致的生態破壞、精神危機、文化衝突等問題愈發嚴峻。第二次啓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旨在對現代性規訓進行深刻反思與解構，為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探尋新的方向。

短片中，金發女子手中的毛綫針最初是創造的工具，隨着編織速度加快，針尖碰撞聲逐漸異化為帶有壓迫性的機械的節拍器。這種轉變暗合了第二次啓蒙對工具理性的批判——當人類將自然簡化為“資源庫”，將勞動異化為可計量的“生產單元”，工具便從手段蛻變為目的本身。懸崖作為現代性規訓的物理化邊界，其深不見底的特性暗示着資本積累邏輯的終極歸宿：無節制的擴張終將突破地球生態系統的承載閾值。

紅色圍巾的墜落軌迹構成精妙的視覺隱喻：從最初的垂落演變為吞噬生命的絞索，這種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恰如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學者格裏芬警示的“現代性困境”——當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攫取突破地球承載力，系統崩潰將呈現非綫性特徵。短片中女子在圍巾墜落瞬間仍試圖用頭發延續編織的行為，將現代性規訓下“增長崇拜”的荒誕性推向極致。

在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看來，現代社會過度推崇消費主義，人們無節制地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積累。在《最後的編織》中，女子不停地編織圍巾，圍巾不斷墜落仿佛是無盡的產出，這可以看作是消費主義下生產的象徵。她盲目地進行編織，不考慮其實際意義和價值，就像現實中人們為了消費而生產，為了追求更多的物質而不斷忙碌，却忽略了內心真正的需求。這種無節制的生產和對物質的盲目追求，最終會將人拖入深淵，就如同女子被圍巾越拉越靠近懸崖邊緣。第二次啓蒙批判物質崇拜導致人們精神世界的空虛。女子一心祇專注於編織圍巾，她的世界似乎祇有這個不斷延伸的圍巾，而忽略了周圍的環境和自身的處境。這反映出在物質崇拜主義的影響下，人們往往祇看到物質的表面價值，而失去了對生活本真的感知和對精神追求的重視。物質成為了一種束縛，使人們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和滿足。

定格動畫賦予角色的機械化動作，解構了第一次啓蒙運動以來“理性經濟人”的虛假神話。女子重複的編織動作與懸崖邊危險的平衡，形成對現代性中“重複勞作”的辛辣諷刺。這種異化狀態在第二次啓蒙視角下，正是主客二分思維導致的惡果——當人類將自然視為可徵服的客體，將勞動簡化為機械流程，主體性便在對象化過程中逐漸消解。

二、重建共生倫理

在現代社會中，第一次啓蒙提倡的主客二分思維模式導致人與自然的嚴重割裂。在短片裏，懸崖是一個關鍵的場景元素，它象徵着人與自然之間的鴻溝。女子站在懸崖邊編織，她與懸崖下方未知的自然世界似乎是完全隔絕的。她祇關注自己手中的編織，沒有意識到自己與自然是一個整體，這種割裂的狀態是現代性帶來的問題。第二次啓蒙強調人與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關聯的，人類應該尊重自然、融入自然，而不是將自然視為可以隨意徵服和利用的對象。

短片音效設計暗含生態整體性理念：編織聲從規律漸變為急促的節奏，與剪刀開合的金屬質感音效形成聽覺蒙太奇。這種聲效並置解構了第一次啓蒙“人類中心主義”的聽覺霸權，暗示着生態系統各要素間的動態平衡。當女子最終剪斷圍巾，剪刀聲回蕩的空曠感，恰似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倡導的“創造性毀滅”——打破舊有規訓才能重建共生關係。女子最終剪斷圍巾的動作，可以看作是生態意識覺醒的象徵。在第二次啓蒙的思想理念中，人類需要意識到自己對自然的責任，主動調整與自然的關係。女子剪斷圍巾，停止了無意義的生產行為，這意味着她開始打破與自然的對立狀態，嘗試重新建立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係。這一轉變體現了第二次啓蒙所倡導的生態整體觀，即人類應該以一種更加謙遜和尊重的態度對待自然。

三、實踐創造性重構

短片中女主角的形象可被解讀為現代人的縮影：對財富積累、經濟增長及社會認同的無止境追求，最終演變為吞噬自我的牢籠。圍巾不斷墜入虛空却無人知曉原因的設定，暗示着盲目努力的虛無性。這種批判超越了個體層面，直指第一次啓蒙塑造的現代性規訓下人類共同的生存困境。

短片結尾女子凝視剪刀的鏡頭，與開頭她飛快編織圍巾的行為形成閉環。這種敘事結構暗示着：救贖並非來自外部幹預，而是源于個體對系統規訓的清醒認知。第二次啓蒙強調的“創造性重構”，在此通過女子從“編織者”到“剪斷者”的身份轉變得到具象化呈現——當人類停止將自然視為可徵服的對象，轉而以共生倫理重構與世界的關係，才能避免墜入深淵。

大衛·格裏芬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為短片提供了理論注腳。他指出：“人類作為整體顯然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創造性的能量，所以我們應積極利用這種創造性，在創造中實現自我的價值。”短片中女子最終剪斷圍巾的行為，正是對“創造性人生”的實踐——她通過否定自我構建的規訓系統，實現了從“工具理性”到“價值理性”的轉型。這種轉型與格裏芬倡導的“在生態有序的規範下實現人的創造性與自然的創造性有機統一”形成呼應。

結語：懸崖邊的共生覺醒

《最後的編織》以其精妙的視覺寓言，實現了從批判第一次啓蒙到建構第二次啓蒙的哲學躍升。它告訴我們：第一次啓蒙承諾的“現代性進步”不過是同一邏輯的墜落循環，而真正的救贖不在於逃離深淵，而在於培養生態整體性視野。當主人公最終剪斷圍巾時，這一決絕姿態不僅是對第一次啓蒙塑造的現代性規訓的徹底解構，更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生動詮釋——唯有打破孤立個體的生存範式，才能重建生命間的有機聯結。

導演在懸崖邊設置的這一存在論劇場，最終指向一種建設性後現代的實踐智慧：社會變革不應止步於對現代性的批判，而需積極建構基於生態智慧的共生倫理。作品中墜落的紅色圍巾，恰似現代文明困境的隱喻；而剪斷後的虛空，則預示着創造性轉化的可能空間。這種既否定又建設的辯證思維，正是第二次啓蒙的精髓所在——在認識到現代性危機的同時，保持對人類共同體未來的創造性重構。人類真正的救贖之路，就藏在這種覺醒與重構的辯證運動中：在墜落中感知聯結，在解構中孕育新生。

（作者佟金丹，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你以為你在經歷人生， 其實人生正在經歷你

鮑凱莉

題記：去年夏季我來到金華，參加浙江師範大學舉辦的第18屆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暑期高級研討班，在海內外學者的傾情教授下接觸了過程哲學。在過去的一個月，我有幸帶領一門關於“人如何真實地活着”的探索，關注的是那些正在發生、却常常被忽略的生命體驗。這正是種子森林始終想要實踐的事情：豐盛生命體驗。感謝 Chris、Xinlin、王治河老師、Jasmine，以及每一位參與其中的人。沒有你們，就沒有這次美妙的旅程。

杯子倒了

我看見它傾斜、墜落，聽見撞擊地面的聲音。幾乎在同一瞬間，我的心跳開始加速，一股強烈的憤怒在體內升起。

這不是兩個事件。

這是同一個事件的不同側面。

外在的“杯子倒下”，與內在那股外人不可知的情緒，同時發生、不可分割。主觀與客觀並非兩個世界，而是一次經驗的兩個面向。

我並不祇是活在自己的主觀感受中。

我是在這個世界中經歷着，而世界也正在進入我。

當我活着，我不斷在選擇：

哪些進入我的生命經驗，哪些被我拒絕在外。

于是我開始意識到：

我不是一個“擁有經驗”的實體，

而是一個正在發生的存在——

不斷與世界連接，也不斷被世界改變。

我的夢，也不是發生在“我裏面”的東西

它同樣是在這個世界中發生的經驗，

進入我的生命，塑造着我正在成為的樣子。

我是流動的。

我是客觀的。

我也是主觀的。

世界是客觀的。

世界也是被經驗着的。

世界不斷進入我，

而我，始終擁有選擇權。

即使我無法主宰外在發生的事件，

我仍然可以，在任何一秒鐘，通過我的內在回應，
改變“發生”的體驗方式。

當糟糕的事情發生時，我的內心常常立刻出現一個強烈的聲音：

“你怎麼這麼笨拙？”

這個聲音如此響亮，以至于我誤以為——

它就是我生命的真相。

但如果我慢下來，會發現：

在那一瞬間，我的身體曾經不可名狀地顫抖。

有一個極其微弱、轉瞬即逝的衝動：

我想逃。

這個感受太輕、太模糊、太不被允許。

于是我忽略了它，

任由自己被那個嚴厲的“判官”淹沒。

但我的經驗，遠比那個聲音豐富得多。

它不僅包含可被分析的情緒與想法，

也包含那些被壓抑、被忽略、位于邊緣的信號。

我的內在，並非單一主體。

它是一場持續發生的對話：

有一個強烈的主角色，
也有微小、模糊、幾乎無名的感受。
那個想要逃跑的衝動，
並不是軟弱。
它是一個從來沒有被真正保護過的自己，
在試圖被看見。

這是一件關於“你是誰”的真相。
當你認為：

- 你的感受就是世界的全部真相
 - 或你的感受根本不重要
 - 或你內在某些聲音不配進入現實
- 你都錯了。

它們不是對立的選擇。
它們是同一經驗的不同側面。
不可分割，
同等真實。

當我進一步去看，會發現：
我們所能分析、命名、測量的一切，
祇是經驗的表層——
像水面上的冰山。

在經驗的深處，水杯不再是一個固定的“物”
它是無數關係事件的匯聚：光線的反射、手的觸
感、記憶的喚起、文化的沉澱。

動詞，才是真正在發生的地方。
動詞讓“物”隱身，
祇留下關係正在生成。
水杯不是被拋棄，
而是被重新理解：
它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Being），
而是一個持續的生成（Becoming）。

當我端起一杯茶，
我感受到重量，
感受到舒心的情緒，
感受到過往喝茶的記憶。
我感受到不在場的茶農，

感受到千百年持續發生的茶文化。
這些關係事件，
穿過合生（Concrescence）的水綫，
涌現為一個穩定、單一的“茶杯經驗”。
于是我明白了：
事物不是存在，事物是正在發生。

我自己，也是如此。

我的衝動、理性與願景不斷衝突、協商、爭奪注
意力。

它們都渴望被納入最終的決定。
我像一位溫柔的君主，
不斷回應它們，
讓每一個聲音參與合生。
正是這個來回移動、調和、掙扎與選擇的過程，
讓我從“成為”中，暫時顯現為“存在”。
那些看似對立的內在力量，
在發生態的深處，其實源于同一個生命渴望。
衝突祇是分離的表象；
統一，才是生命的真相。

當我繼續向下體驗，我發現：
心智不是“有”或“沒有”。
它是一個從宇宙底層到人類意識的連續尺度。
心智的證據在於：
回應（Response）。

當我像一塊岩石一樣感受世界，我感受到溫度變
化帶來的擴張，感受到千萬年時間緩慢流過。

在放下人類中心之後，
我體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穩定——
一種祇有極低自由度、極長時間尺度，
才能承載的存在感。
當我像一隻鳥、
一棵樹、
一隻昆蟲，
我體驗到各自尺度上的持續回應。

世界，在我眼中不再是惰性的物質堆積。
它是一片由經驗之滴構成的動態過程。
世界是活着的。
我開始尊重萬物的內在價值，
同時也清楚地知道：
行動必須考慮尺度、後果與現實。
尊重連續性，
實踐差異性。

這不是一種觀點。
這是一次不可逆的觀看方式。
當你意識到世界正在回應你，

你就再也無法
無意識地活着。

後記：

這次共學以過程哲學與過程心理學為起點，却最終指向一件更簡單、也更徹底的事情：我們如何正在活着。我的願景，是讓更多人能夠親身經歷這種豐富的生命體驗。正如懷特海所說：活着，好好活着，活得更好。

（作者鮑凱莉，種子森林工作室創始人，關注創造使人得以自主成長的環境）

《世界文化論壇報》徵稿啟事

《世界文化論壇報》(Culture Communication) 由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是海外獨家以文化與思想為核心訴求的華文報紙。創刊二十餘年來，本報始終立足全球視野，面向世界華人社會，致力於推動中西文明的深層對話，回應人類共同面對的重大時代議題，在反思現代世界觀與發展路徑的基礎上探討文明轉型的思想資源與實踐路徑。

本報長期徵集以下方向的原創性稿件：

- ☆ 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與文明轉型的思想探討
- ☆ 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及其當代意義
- ☆ 中西文化、文明深層比較與對話
- ☆ 教育、經濟、科技、企業等領域的深刻反思與價值重建
- ☆ 具有思想深度的文化評論和學術隨筆

來稿應觀點清晰、論述嚴謹，具有思想原創性與現實關切，避免空泛議論與純資訊性寫作。

字數建議：3000 字左右

投稿方式：電子郵件投稿

投稿郵箱：ipdclaremont@yahoo.com

網站：www.postmodernchina.org

歡迎來自兩岸三地、北美及世界各地的華文作者踴躍投稿，與我們一道，在複雜多變的時代中，展開有深度、有溫度的思想對話。

您的支持：《世界文化論壇報》系統公益性文化媒體，歡迎您任何形式的支持與幫助。學術上的支持可通過惠稿；經濟上的支持可採取直接贊助的形式，所捐善款可以免稅。

線上捐款請掃描二維碼或訪問研究院網站：



<https://postmodernchina.org/donate.html>

生態文明新術語——生態發展

吳祖洪

“生態發展”(ecodevelopment)一詞是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莫裏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創造的,用來表示一種替代現代經濟擴張模式的經濟發展形式。就目前的用法而言,它指的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理論,也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理論。它得到了許多與國際社會各種組織相關的經濟學家和開發人員的支持,例如1974年在科科約克(Cocoyoc)舉行的環境規劃署/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研討會、1974年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原材料與發展會議、巴黎國際環境研究中心和柏林國際環境與社會研究所等國際組織下屬的研究中心,以及加拿大環境部、加拿大國際開發署和墨西哥科學技術理事會等一些國家政府部門。

生態發展是一種既具有社會包容性又尊重環境的發展。生態發展捍衛者認為,發展的目標仍然是社會性的,這些社會目標必須與越來越強烈的環境制約因素相一致。為了使發展模式有機會發揮效率,所設想的經濟解決方案必須是可行的。

這一“生態發展”的簡潔的定義以如下“三大支柱”為檢驗標準:

第一個支柱是自力更生。其隱含的思想是,北半球富裕國家採用的發展模式並不適合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普及推廣為了遠離這種浪費自然資源的模式,每個國家、每個社會都必須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意味著必須以自主的方式做出決定。必須出現替代模式,這些替代模式應該考慮到每個國家的歷史、生態和總體背景的差异。

第二個支柱是對每個人的基本需求實施平等管理。有形需求,例如住房、食品;無形需求,例如教育、性。需要強調的是,有些有形需求也是無形需求,例如醫

療、保健。為了使每個人都能夠過上對自己有意義的生活,有形需求和無形需求必須結合起來並得到滿足。

第三個支柱是生態警告。生態發展整合了環境的制約,但生態發展的概念介于以下兩種概念之間:一方面是基於唯生產論的增長模式,這種模式導致資源浪費;另一方面是一種激進的環境運動,該運動認為發展必須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種兩難的生態發展概念在70年代和80年代曾引起發展中國家的興趣,但後來被邊緣化了。最強大的國家顯然不太喜歡這個想法,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必須質疑自己的發展模式。所以生態發展概念逐漸被放棄,讓位於可持續發展的新概念。

生態發展是基於生物圈資源長期優化的一種保守性發展,其方法包括通過適當的技術和生產系統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進行發展,考慮並規化自然保護。以亞洲的生態發展模式為例,其發展重點從高經濟增長轉向更廣泛的可持續性和生態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是追求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為與環境相關的設施和技術會帶來創新、工業發展和投資。另一方面,亞洲國家也希望獲得國際生態領導力。民間社會的環境意識和地方政府的貢獻也是發展這一模式的關鍵:儘管各國存在差异,但大多數亞洲國家在國家政策實施之前都有長期的地方決策的實驗傳統。這種模式的其他支持因素包括產業與國家目標的一致性、國家能力和執政黨的支持。此外,外部因素包括市場競爭、運營成本和獲得競爭優勢的可能性。最後,生態發展型國家最重要的是發展,這意味著決策機構和國家計劃主要關注增長,而不是純粹的生態。

(作者吳祖洪,北美獨立學者)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

樊美筠

編委:

王治河

朱易

謝文鬱

黃勇

馮毅

曾慶華

倪培民

王蓉蓉

顧問:

葉朗

周桂鈞

安樂哲

樂黛雲

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丁宏偉

王寅

任平

劉孝廷

成長春

劉全華

劉笑敢

李晨陽

曲躍厚

陳俊偉

李惠斌

林克勤

吳國盛

楊富斌

陳榮灼

歐陽康

張修玉

俞懿嫻

顧林玉

郭海鵬

魯樞元

鞠實兒

溫恒福

責任編輯:

許迎輝